

中共党内称呼的优良传统与政治规矩

冷兆松

[摘要]对党员干部以官衔相称、“同志”反而叫不出口的党内称呼问题,经过1943年、1959年、1965年、1978年、2003年、2014年等多次纠正,不但依然惯性发展,而且竟然变本加厉起来。我们相信,对于这样一个年代久远的遗留问题、长期形成的惯性问题、屡攻不克的老大难问题,只要广大党员干部严格遵循中央关于党内称呼的政治规矩,以习近平所说的恒劲、韧劲、拼劲认真对待,终究是能够解决的。

[关键词]党内称呼;干部称呼;优良传统;政治规矩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16)10-0008-04

一、党内称呼的优良传统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里,历来有一种好传统,不论上级和下级、干部和群众之间,都是互称同志,或者直呼老张、老李。称同志,不称官衔,有利于打掉官气放下架子,有利于密切上下关系、干群关系,有利于防范领导干部产生官僚主义,有利于端正党风。优良的党风可以促政风带民风,优良的党风是凝聚党心民心的巨大力量。

1929年5月,红军来到古田。这天,贫农廖大哥去帮红军做饭。晚饭开过好久,红军首长才回来。他一进灶房,看到廖大哥,就亲热地问:“辛苦了!老兄弟,贵姓?”廖大哥心头一热,半晌才回答:“姓廖。”“啊,老廖同志!”首长又亲切地问:“多大年纪了?”廖大哥答:“三十七了。”“呵,真巧,我们还是‘同年’呢!”关切亲切的话语,象春风吹开了廖大哥的心扉:过去,有钱人总叫他“讨食鬼”、“老长工”;如今,红军首长却称他“老兄弟”和“同志”,还同自己认“同年”,真是寒冬炭火暖全身啊!他一问,这位首长就是毛泽东。^[1]

周恩来曾对他的秘书、警卫员和炊事员说:“我在支部里是一名党员,不是总理。你们不要叫我总理,就叫恩来同志。”^[2]张际春是我军最早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之一,为创建红军政治工作作出了贡献。^[3]殷步实回忆说:有一

次,他送去的编好的部队来稿中有“马夫”、“民夫”、“俘虏兵”等词,张际春副政委严肃而又耐心地对他讲,我们共产党人和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阀部队语言、文字称呼有着根本的区别。我军的干部和战士只是职务上分工不同,但在政治上官兵是平等的,我们应当在语言和文字上称“伙夫”为“炊事员”,“马夫”称“饲养员”,“民夫”称“民工”,国民党军队放下武器自愿参加我军的士兵应称“解放战士”。党内和党外称呼也不一样,在党的会议上都是共产党员,应称同志,不应称某同志行政职务,如某司令员、某政委就不对了。^{[4](pp.379-380)}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在陕甘宁边区扎根稳定之后,干部称呼的优良传统继续得到保持,这是主流;但是,也出现了“首长”称呼泛滥的问题,我党干部称呼的优良传统被一些人淡忘了。

刘少奇及时注意到这个问题。1943年9月7日至10月6日,刘少奇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发言中指出,我们“应该有意识地造成健全的布尔什维克传统……发言一律称同志,不称首长”。^{[5](pp.430-431)}

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是同志称呼迅速扩展到各行各业各领域,这是主流;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种支流,有些人看轻了同志称呼,认为称呼职务、官衔才是尊重对方。于是,不但行政部门称张市长、王县长,而且党组织系统也出现了称呼李书记、赵部长、孙常委等。在有的

作者:冷兆松,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地方甚至出现一种荒唐现象,叫什么胡党员、周党员之类。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这种称呼上的混乱,诱发上下级之间的疏远,党员和群众之间的疏远。称职衔而不称同志,是旧社会等级观念死灰复燃的反映,是政治思想的模糊。这是件大事,绝非无关重要的小事。^[6]

1943年,刘少奇提请大家注意干部称呼的问题,但是,问题没有得到遏制和解决,到1959年已经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标志之一是干部称呼问题在中共中央会议简报中已经突出地表现出来了。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2日至16日举行的八届八中全会,统称为庐山会议。在庐山会议的每日简报中,党内干部称呼问题的情况之严重,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和重视。

二、毛泽东高度重视解决党内称呼问题

1959年8月3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周恩来、彭真^①、杨尚昆^②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信中写道:庐山会议简报上“对于同志的称呼不妥当,这种旧习惯应当改过来。建议:一律称某某同志。例如:主席,称毛泽东同志;总理,称周恩来同志;林总,彭总,贺总,称林彪同志,彭德怀同志,贺龙同志。其他,以此类推。如同意,请各组长在会上宣布一下。请尚昆告简报编者,一律从四日起照此改正”。^{[7](p.409)}

毛泽东为什么说庐山会议简报上对于同志的称呼是一种“旧习惯”? (1)主席、总理,这是对毛泽东、周恩来现任职务的称呼,实际上也是他们革命生涯中的最高职务。(2)林总、彭总、贺总,虽然不是对这三位现任职务和最高职务的称呼,却是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叱咤风云的重要职务,所以,叫一声林总、彭总、贺总,人们自然就联想到三位开国元帅炳彪史册的赫赫战功。(3)称呼毛泽东、周恩来为“主席、总理”,称呼林彪、彭德怀、贺龙为“林总、彭总、贺总”,都属于就高不就低的“戴高帽”性质的称谓。(4)这种奉承恭维之举,实属人所共知的旧社会的旧习惯,与中国共产党人共产主义的理

想信念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是格格不入的。因此,毛泽东主张,共产党人应该废止“戴高帽”的旧习惯,建议无论职位多高、功劳多大,一律称同志。同志称呼破除了中国几千年剥削社会贵贱尊卑等级森严的旧观念、旧习惯,同志称呼表明彼此是由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共同的革命任务联结在一起的。

在解决干部称呼问题上,毛泽东主张中央领导干部率先垂范,推及全党。他主动提出从自己做起,从中央领导人做起,“以此类推”到所有干部。他建议:在简报中将对对自己的称呼改正过来,不要称“主席”,改称“毛泽东同志”;周恩来、林彪、彭德怀、贺龙等其他中央领导人,不要称总理、老总之类,一律称某某同志;“其他,以此类推”,也就是说所有干部,也都一律称同志,不能称官衔、职务、老总等。

毛泽东主张解决干部称呼问题,要公开宣示,雷厉风行,马上改正。毛泽东在信中提出,如果大家同意纠正旧习惯而一律称同志的建议,那么,请参加庐山会议分组讨论的各组长在会上宣布一下,请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转告简报编者“一律从四日起照此改正”。这封信写于8月3日,4日就是第二天;也就是说,毛泽东要求中央有关方面当天议定,第二天就传达,并付诸行动,不允许议而不决、决而不动、动而无果。

对解决党内干部称呼问题,毛泽东是高度重视的。(1)从信息传递形式上看,毛泽东不是让秘书打电话传达自己的看法和建议,而是以给中央有关领导人写亲笔信的形式提出问题及其解决方案。(2)从措施执行力度上看,可以用“雷厉风行”四个字来形容。毛泽东3日写信,要求4日即第二天就公开宣布并全面实施,不允许拖沓延误,不允许举棋不定,不允许讨价还价,不允许观望变通。

三、党内称呼的政治规矩、政治纪律、政治观点

毛泽东在1959年8月3日信中提及的建议和要求,后来被中央作为重要文件在全党推进执行,要求大家互称同志,改变以职务相称的旧习惯,恢复我党称呼的优良传统。但是,实

^①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②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际上,许多地方和部门,一直没有认真执行。在这种情况下,1965年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了《关于党内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的通知》,将党内干部称呼的政治规矩、政治纪律、政治观点,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下发到所有基层党支部,并在所有党刊上登载,以督促执行。

(一)《关于党内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的通知》的主要内容

196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党内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的通知》,主要内容如下:(1)关于党内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毛泽东早在1959年就有过指示,要大家互称同志,改变以职务相称的旧习惯。几年来,许多地方和部门,一直没有认真执行。(2)过去我们在根据地的时候,不论领导干部和被领导干部,或者党员、干部之间,大家都是互称同志,广大群众对干部也都采用同样的称呼,或直呼为老张、老李,使人感到十分亲切。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多人渐渐丢掉了这个好传统,而以职务相称。有些干部,人家不叫他官衔,不称他某书记、某常委、某部长、某支书、支委,还不高兴,好像是不尊重他。这是一种旧社会的腐朽习气和官僚作风,同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格格不入的。(3)今后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互称同志。(4)此件发到所有基层组织——党支部,并在所有党刊上登载。^{[8](p.406)}

(二)党内称呼的政治规矩、政治纪律、政治观点

中共中央《关于党内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的通知》确立了如下几条重要的政治规矩、政治纪律、政治观点,并且通告全党、明令遵行。(1)确立了一条禁止性的政治规矩——废止以官衔、职务相称的旧习惯。(2)明确了一个政治观点——以官衔、职务相称呼,这是一种旧社会的腐朽习气和官僚作风,同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格格不入的。(3)重申和明确了一条政治纪律——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互称同志。这条政治纪律包括两项政治规矩——其一是同志称呼的适用范围,包括“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其二是同志称呼的一律性和唯一性要求,强调和明确“一律”二字,这意味着党内只能称同志,而不准使用官衔、职务、老大、老板等任何其他称呼。(4)通告全党,明令遵行。“此件发到所有基层组织——党支部,并在所有党刊上登载”,这就意味着一律互称同志的政治规矩,在1965年已经公开通报全

党所有支部和全体党员。

总之,党内一律互称同志的政治规矩,作为党内一件政治大事,在1965年就已经完全成熟、定型,并且,公开通告所有党支部和全体党员,明令一律遵行。

四、中央重申党内称呼的政治规矩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大以后重申党内称呼的政治规矩

1978年12月22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全会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9](p.13)}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1979年5月的《人民日报》刊文指出:关于党内称呼问题,党的三中全会又一次明确提出党内要称同志,但时至今日,几个月过去了,很多单位的党员和负责同志,在党组织的会议上或日常接触中,还是称官道职,很少听到称“同志”的。^[2]

2003年,全国各地党委都曾专门制定和下发《关于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党内互称同志优良传统的通知》,要求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称同志,不以职务相称。例如,甘肃省的文件就要求,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称为同志,党内刊物、文件和其他书面材料也要按此办理;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带头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做党内互称同志的表率;各级党组织要制定完善相应的制度,并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形成党内互称同志的有效机制。^[10]

(二)十八大以后中央确认1965年《关于党内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的通知》继续有效

十八大后,中央对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理,2014年11月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再废止和宣布失效一批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对新中国成立至1977年期间中共中央制定的411件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160件被废止、231件宣布失效、20件继续有效。1965年《关于党内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的通知》被确定为继续有效,这就表明,党内一律互称同志的称呼规定,在十八大以后依然是中央明确的必须遵行的重要政治规矩。

从1943年我党首次明确提出党内称呼问

题,至今已经有70多年了,不但未获得解决,而且称呼乱象反而愈演愈烈。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大小公司等有干部的地方,对干部的称呼通常都是官衔,称呼同志的近乎绝迹。对于党政机关基层的许多官员来说,“逢长必叫,叫大不叫小”已经是相互称呼时的惯例。在县里,一个科级干部就很大了。一个局长其实是科级,但是人们都叫他局长。股长比科长还要小,但在县里也不算小了,也是一个长,也要叫出来。“叫大不叫小”的惯例不仅仅是基层的专利。一位资深媒体人对《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说:在一些部委,如果党组书记和部长不是同一个人,下属们也会叫党组书记“部长”。正部级机构的领导如果职务名是主任或者局长的,他们的下属会叫“部长”,害怕与低级别的职务混淆,因为部长级别高,而办公厅主任也是主任。^[1]

习近平指出:对那些“年代久远的遗留问题、长期形成的惯性问题,要以燕子垒窝的恒劲、蚂蚁啃骨的韧劲、老牛爬坡的拼劲,坚持不懈,攻坚克难,善作善成。”^[2]对党员干部以官衔、职务相称,“同志”反而叫不出口的党内称呼问题,经过1943年、1959年、1965年、1978年、2003年、2014年等多次纠正,不但依然惯性发展,而且竟然变本加厉起来。我们相信,对于这样一个年代久远的遗留问题、长期形成的惯性问题、屡攻不克的老大难问题,只要广大党员干部严格遵循中央关于党内称呼的政治规矩,以习近平所说的恒劲、韧劲、拼劲认真对待,终究是能够解决的,绝不会成为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五、对党内称呼政治规矩的认识

对党内称呼政治规矩的认识和适用,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首先,党内称呼不是随性的小事,而是关系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抵制和克服旧社会腐朽习气和官僚作风的政治大事。中共中央的这个政治观点,非常明确地在《关于党内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的通知》中予以说明了。因此,对党员干部的称呼,必须严格遵循中共中央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一律称呼同志,不得称呼其他。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其次,不是说对党员领导干部在任何场合都不能称呼职务。在一些场合,公开亮明领导干部的职务身份是工作需要,这个时候这种场合就应该而且必须称呼其职务。例如,我们在媒体中听到、看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职务称呼,这是一种工作需要,为了突出和强调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的大政方针、基本立场、重要动向,有利于最大程度地占领舆论的制高点,最大范围地传播中央的声音,并不是为了突出个人,并不会形成任何不良后果,^①从而并不是对党内称呼政治规矩的破坏。70多年来党内称呼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区分这两种情况造成了认识方面的混乱,认为中央文件、领导讲话、媒体报道中不称呼党员领导干部为同志而称呼其党政军职务,就误以为党内称呼的政治规矩只是说说而已,不是认真执行的。其实,这是由于人们混淆了这两种情况而产生的误解。

[参考文献]

- [1]饶平.山高水长同志情[N].人民日报,1979-07-14.
- [2]李志远.何时听到称“同志”的声音?[N].人民日报,1979-05-22.
- [3]宋任穷.《张际春文选》序言[N].人民日报,1990-12-15.
- [4]殷步实.人民不会忘记您——际春同志[C].张际春.张际春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
- [5]刘崇文,陈绍畴.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 [6]李荒.同志颂——一个共产党员的心声[N].人民日报,1990-10-30.
-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8]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9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10]中共废止691件党内法规“互称同志”依然有效[EB/OL].
<http://news.qq.com/a/20141118/013727.htm>.
- [11]鞠靖,孙甜甜,杨翹楚.官场“称呼学”[EB/OL].<http://www.infzm.com/content/100108>.
- [12]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03.

责任编辑:美景

^①胡锦涛、江泽民在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时期,在适当的时候和场合,我们也是这样称呼的。当他们代表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参加重要活动和发表重要讲话时,我们这样称呼其职务是为了突出和强调中央的声音。历史事实已经证明,这种做法的效果是好的,没有形成个人崇拜等任何不良结果。

A Couple of Basic Right-Wrong Relations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Xi Jinping proposes that we should maintain the right direction for study. Otherwise, ignoring the direction guided by Marxism would have us lost in complicated situations and become incapable of preventing wrong ideological trends. Due to various reasons, people could not see eye to eye on the basic relations and right-wrong issues of national reality and reform. Hence, tackling right-wrong relations calls for upholding the all-rounded unification in eight aspects: the unification of the core economic construction with ideal faith, that of stressing proceeding from reality with stressing the guidance of theories, that of innovation and reform with carrying forward refined traditions, that of catching up with the international with taking Chinese pathway, that of upholding outstanding national and historical cultural traditions with mitigating superstitious backward customs, that of safeguarding individual rights with upholding socialist collectiveness, that of anti-corruption with reform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unifica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th scientific socialism. (Cao Yong-xin)

The Refined Traditions and Political Rules of Salutation Inside CPC: The problem of greeting CPC cadres with their official titles rather than comrades has been repeatedly rectified in 1943, 1965, 1978, 2003 and 2014 in vain and got more serious. It is believed that we could overcome this long-existing problem with deep-rooted propensity and repeated mistake even after various times of education, as long as most CPC cadres strictly adhere to the political discipline for salutation title inside the Party and go with persistence, stamina and tough trait suggested by Xi Jinping. (Leng Zhao-song)

The Leadership of CPC as the Essen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leadership of CPC is the essen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is defined by the pathway to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the pioneering nature of CPC. Chinese pathway is rather opened up and explored by Chinese peopl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PC than designed and outlined by classical Marxist authors in advance. CPC has long been consistent with the unification of maximum and minimum programs either in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or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To carry on the mission of building up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PC shall hold fast to its initial determination, run the party with strict rules, and uphold the banner of communism. (Ma Yong-jun)

On Xi Jinping's Important Statements on Juveniles'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 focus on youth work and to put emphasis on cultivating juveniles'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a refined tradition of CPC, which is carried on by Xi Jinping. A series of Xi's significant speeches includes ample statements on juveniles' social responsibility. His statements on this issue could be generalized into four aspects: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for oneself in a sense of fostering all-rounded development, responsibility for others represented by the care for family and friends, responsibility for the nation in a sense of promoting national union, carrying forward traditional refined cultures and displaying a outstanding national figure, and responsibility for the world to promote cultural and humanistic exchange, safeguard the world peace and carry forward human civilization. (Ma Jian-qing and Chen Zeng-yan)

On the Approaches to and Policy Suggestions of Developing New Collective Economy in Rural China: Investigations into Certain Chinese Rural Areas: New collective economy refers to new economic organization forms for common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voluntarily association of laborers in labor or in capital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modern property rights system. Its major development modes include the mode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gricultural service provision, asset leasing and resources exploitation, while the realization forms consist of unified management under collective ownership, land shareholding cooperation, member shareholding cooperation, and mixed ownership in association with social capital. To promote new collective economy, we should firstly stick to land collective ownership, respect farmers' voluntary participation and follow market mechanism. We should also deepen the reform of rural collective ownership, formulate regulations concerning community shareholding cooperatives, and improve shareholding entry-withdrawal mechanism and relevant preferential tax policies (Yuan Peng and Liu Tong-shan)

The Process of Rule of Law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can provide a legal way for the public to participate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aking up for the limitation of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deterring illegal behaviors and preventi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should develop simultaneously.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market-oriente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run through all aspects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while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postulate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The backwardness of social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flawed market mechanism for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re major bottlenecks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Further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should include cultivating and guiding social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s, establishing a third-party environmental evaluation system, building up a market mechanism for environmental remediation, and promoting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Cheng Jin and Zhou Feng-qi)

An Analysis of Public Properties in Small Towns under Shared Development: The core of new urbanization lies in the urbanization of men while public property supply is a significant approach to elevating people's livelihood and life standard with the aim of urbanizing people. Constrained by economic development, current fiscal investment mechanism, and incomplete supervision system, public property supply varied dramatically in terms of quantity and quality between cities and their surrounding towns. To narrow down such disparity, we shall implement versatile supply mode under the guidance of shared development, optimize the balance of resources distribu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construct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for public property supply directed by shared development, build up and improve incentive and supervision mechanism,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public property supply in small towns. (Liu Zheng and Chang Zhen)

Household Wealth Concentration in China and Its Regulatory Measures: The last thirty years witnessed not only lasting rapid economic growth but increasingly wider wealth gap. Unbalanced wealth distribution has nowadays become a significant economic and social issue. The accumulative effect of income gap has massively contributed to wealth concentration, while the latter has enlarged the income gap. Wealth concentration and undue wealth gap result from the common effect of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market mechanism malfunction, ineffective tax regulation, anomie in capital and real estate markets, and invisible income concentrated among the rich. They will lower residents' life quality, weaken the social status of common workers, reduce the effectiveness of resources distribution, and breed credit absence and corruption. Containing ongoing wealth concentration and narrowing wealth gap lies in reforming income and wealth taxation, establishing residents' income account and credit system, improving income distribution, narrowing wealth gap and promoting wealth equity. (He Yu-chang and Zong Su-juan)

Reflection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Faith: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well-off society in a all-round way, the moderniz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rompts people's rationale and independence, continually sparkles their tendency towards reflection and self-awareness, and provokes the issues of people's faith. It is observed from Marxist materialistic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at the faith of those who are involved in